

# 上海人形成略论

陈华文/著

【摘要】 上海是中国近代历史中具有非常独特个性和世界影响的城市。由于它的特殊形成和它的发展个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海派”已不仅是上海人代名词,而且成了中西文化交融、不同移民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代名词。本文所说的上海人,就是在这样一种中国近代史的特殊历程和上海城市文化畸形发展,以及上海人移民的大汇聚的历史背景下铸就的。

【关键词】 上海人; 族群; 中西文化; 移民; 人文特征

【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1999)01-0012-15

上海人和上海一样声名远扬。然而,上海人的这种知名度获得却有赖于中国近代史中一段不幸的历史,有人对此这样概括说,“历史的不幸,莫过于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主权而在上海设置了租界,设立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内的政权组织,其行政、立法与司法,均为中国主权所莫能干预,成了‘国中之国’;其对于中国的侵略与罪恶,彰彰易辨。历史的奇异,也无过于这种和侵略与罪恶而俱至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法律准则,乃至市政建设管理、政权结构等等包括精神与物质两方面一系列的思想与事物,一经传入,上海人初则惊,继则效,上海乃至巨变,并经由上海影响及于全国。西方列强,在此充当了历史发展不自觉的工具。”上海在很短的时间之中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无论如何都有点像“暴发户”,在世人的心目中,上海文化与上海人一样和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有一种难以溶入的感觉。

无论如何这是一片古老的地区,在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儿就生息了先吴或先越的原始族群,他们创造了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具有东南地区典型文化特征的原始文化类型,成为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摇篮之一。虽然上海这一特称直到宋代时才出现,但关于上海称“沪”或称“申”的由来,则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沪”是沪渎,但更重要的是,“沪”是一种捕鱼渔具,今天作“簖”,沪渎即由具有特点的捕鱼渔具而命名,因此,“沪”其实就是原始人的一种捕鱼方式。至于“申”,则源于战国时的春申君黄歇曾封于此地,黄浦江即由黄歇浦简称而来,“申”则为春

申的别称。当然,这种历史更多的不是出于文字的记载,而是传说或附会。

上海人真实的依托是现在并不被认定为正宗的华亭,它建县于唐天宝十年(751年),后改为松江,即今上海市松江县治所在。这种关系一直到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析华亭县的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五乡为上海县才得以改变,上海人也因独立的行政区划的建立而成为独立的族群。然而,那毕竟仅仅是滨海一县而已,在中国的广阔区域当中,上海没有鹤立鸡群,即使它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优越的地位,由于自给自足经济的局限性,它的潜在的价值并未被人们所认识,上海人依然没有为人们所认同的特点。

上海人所具有的区域性世界性的特点的出现,是在中国人被外国的炮舰打开门户被迫对外开放之后。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1843年根据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上海被规定为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845年,英国殖民者在上海县城的北面首先设置了英国的“居留地”,之后,美法等殖民者都先后占据了大片的特殊区域,即后来人们所习称的“租界”。

租界的设立既造成了殖民者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管理模式、法律制度。另外,由于它不受中国政府的直接管辖——“工部局”(后来法租界成立了“公董局”)成了租界的变相“政府”,巡捕房是它的警察机构,会审公廨是它的司法机关,整个租界俨然成了“国中之国”。然而,正是这种“国中之国”的特殊地位,在近代中国时局风云变幻时代之中,特别是在激烈动荡的历次战争,如

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武昌起义等时期，租界的“特殊”地位，既保证了那些官员和有钱人的“避难”，也保护了那些为躲避战祸而逃入租界的平民，后来，租界也保护那些对现政府不满而策划革命或宣传鼓动革命的志士。当然，主要原因是他们并没有违犯租界的有关“法律制度”。

租界的自由通商和大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特殊”地位，使它不仅在商业，也在人口增长、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文化模式等方面有别于中国的其他地区。中国的第一条铁路、第一盏电灯、第一辆电车、第一部电影都诞生于上海。日本人峰源藏任《清国上海见闻录》中曾对当时的公共租界和原上海县城进行过比较性描述。他说：租界“道路清静宽广，巡捕往来梭巡周密，团练兵操演步伐整齐，舍宇栉比鳞次……淤隘逼仄之路悉化而为康庄，乡间鄙陋之区皆变而为；四方之人趋之若江汉之朝宗，商贾往来，无远勿届；街衢之间，日事洒扫，迂者直之，跛者平之；房有失慎，捕房鸣钟报警，水龙、火龙、药龙络绎奔赴。”而上海县“城内街道极为狭隘，阔只六尺左右，因而行人往来非常混杂拥挤。垃圾粪土堆满道路，泥尘埋足，臭气刺鼻，污秽非言可宣。”这种现代新兴城市与中国传统城市之间的区别，上海人自己也作过比较性的描述，认为“租界马路四通，（上海县）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别。”这种巨大的差别，在商业上也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据统计，到抗日战争前，除东三省外，外国资本的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的81.2%集中在上海，银行业投资的79.2%、工业投资的67.1%、房地产的76.8%也均集中在上海。上海的优越地位，加上殖民者的资金和特殊的管理模式，使上海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解放前夕，上海已同世界上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三百多个港口有着贸易往来和经济联系。很长时间以来，上海直接对外贸易值占全国对外贸易总值的一半以上，如1894年占53.44%，1933年占53.37%，1936年占55.56%。同时，上海也是国内商业贸易的中心，1936年上海对全国各地通商口岸的贸易总额近九亿元，占全国的75.2%，1944年这种比重更上升到占88%。上海也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不但外资银行主要设在上海，华资金融业在上海也占有很高的比例。1936年上海有华资银行58家，占全国总数的35%。上海更是全国工业的中心，1933年上海工业资本总额占全国的

40%，工人占全国的43%，产值占全国的50%；1947年，上海的工厂数占全国的54.95%，工人所占的比例则上升到53.84%。

上海在成为中国和世界意义的新兴城市的同时，在文化模式方面也有别于中国的传统城市，因此，在上海人的人文特征方面，西方文化和东西杂糅的文化在上海随处可见。

首先是西方的商业洋行到处出现，1843年开埠不久，仁记洋行、颠地洋行、怡和洋行等就在上海筹建洋行楼房，第二年先后建成11家。到1854年，仅仅过了10年，外国在沪的洋行已有120家。其中许多靠走私私家的洋行，在继续从事鸦片等毒品走私活动之时，也进行大量的商业贸易交易，给中国人带来鸦片等毒品，也给中国人带来西方的工业产品。这给上海人的物质观念，带有明显的西方化倾向。

其次是建立了维护租界利益的一整套西方资本主义城市的管理模式，在早期的“道路码头委员会”的基础上1854年出现了一个行政委员会，即后来人们习称的“工部局”，它全面管理租界的行政事务。到抗日战争前，工部局直属委员会和办事处各有13个，成了一个庞大而又组织严密的市政机构。同时还有一整套的警察和司法机构，来共同负责租界的安全。这给上海人的文明观，很早的时候就打上西方制度的烙印。

第三是建立了大量的现代模式的工厂，从修船厂到机器制造厂到纺织厂到外加工企业，不管是外资的还是民族工业，都从根本上变革着传统中国人对待科学技术的心态。到20世纪之后，上海最终确立了中国的甚至是远东的工业中心地位。这在最大程度上改变了上海人的生存和谋生方式。

第四是西方物质文明大量涌入。比如煤气的使用，改变了上海人长期使用油灯的习惯；电灯的使用，则更开辟了一个照明的新时代；铁路的建造和使用，改变了上海人行旅方式，还对中国各地资源的开发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城市自来水的建成，改变了上海人的饮水方式和卫生习惯；电报电话的引进和使用，则改变了上海人传统的信息交流方式，如此等等，改变了上海人的整个生活模式。

第五是中西结合的娱乐文化，如西方的夜总会俱乐部以扑克、轮盘赌、跑马、跑狗赌博等方式与中国的赌博形式如骰子、骨牌花会以及娼妓等无处不在，大上海的灯红酒绿使它成了地痞流氓和冒险家的乐园，有钱人的销金窟和天堂。这对上海人开阔眼界，甚至傲视中国其他传统的娱乐，都起了直接作

用。

有人对上海人这种中西杂糅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概括并写成《申江好》一词：“申江好，万国竟来同，海舶几多浑莫辨，地球何处不相通，人巧夺天工。申江好，铁厂最新奇，自昔公输无此巧，其中虚妙有谁知，从此废工师。申江好，马路说洋场，万户千门皆孔道，四通八达尽康庄，示我咏周行。申江好，地火最光明，漏转铜龙夸不夜，花开铁树照深更，比月更澄清。申江好，电线疾雷霆，万里语言同面晤，重洋信息霎时听，机话竟无形。”西方文明，无疑给当时的上海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更给后来我们常说的上海人的文化性格，铸下了无法抹去的烙印。

上海的特殊成就，奠定了上海城市的特定位置，也铸造了上海人特殊的族群性格。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还有一方面是上海人都是全国各地的移民。他们之中的约80%（综合华界与租界）都不是正宗的“上海”人。鸦片战争前，上海全县人口为50余万，县城及近郊人口仅20余万。鸦片战争后，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西方殖民者开始进入上海。最早是英国人，1845年在上海县城北面设置的英国“居留地”。此后，美、法也相继在上海建立“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即后来我们习称的“租界”。租界内的航运、商业和现代工业的迅速崛起和繁荣，吸收了大批劳工和投资者。这当中最早进入上海从事商业活动的是广东的买办，人数也最多。王韬《瀛杂志》说，“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接着发展起来的是为外国殖民者和买办服务的佣人、厨师、车夫、船夫和其他苦役等，他们大都来自上海城乡各地，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与此同时，随着运输业的兴盛，吸收了大批搬运工人。而近代工业的兴起，像船厂、机器制造厂及外加工企业等工厂企业，则铸造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他们来自全国不同的地方，但大多数为江苏、浙江、广东和安徽等省人（见表1至表4）。这是上海吸收外来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1 旧上海“华界”上海籍人口与非上海籍人口

年代	上海籍人口		非上海籍人口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930	436 337	26	1 255 998	74
1932	430 875	28	1 140 214	72
1934	488 631	25	1 426 063	75
1936	513 810	24	1 631 507	76

资料来源：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2页。

表2 旧上海公共租界上海籍与非上海籍人口

年代	上海籍人口		非上海籍人口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885	15 814	15	93 492	85
1895	40 470	19	178 836	81
1905	67 600	17	322 797	83
1915	91 161	17	448 054	83
1925	121 238	17	660 848	83
1935	236 477	21	884 383	79

资料来源：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112页。

表3 旧上海“华界”非上海籍人口籍贯的构成 (千人)

年代	江苏	浙江	安徽	广东	湖北	河北	山东	南方其他	北方其他	合计
1930	692	342	60	41	24	19	27	31	20	1256
1932	644	284	65	22	27	20	26	30	21	1139
1934	783	358	87	49	34	37	32	37	10	1427
1936	902	413	95	57	35	40	36	43	11	1632

资料来源：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115页。

说明：1. 各年平均为9月份人数；2. 江苏项中不包括上海籍人口；3. 外国人除外；4. 北平人口列入河北人口中；5. 原表中的其他作北方人口处理。

表4 旧上海公共租界非上海籍人口籍贯构成 (百人)

年代	江苏	浙江	安徽	广东	湖北	河北	山东	南方其他	北方其他	合计
1885	238	413	27	210	6	19	4	13	5	935
1895	607	775	26	312	11	22	7	23	4	1787
1905	1014	1340	74	546	47	47	29	105	25	3227
1915	1392	2012	155	448	80	72	52	200	70	4480
1925	1869	2291	265	514	149	158	122	464	178	6010
1935	3547	3889	310	533	97	114	148	156	50	8844

资料来源：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115页表22及上表2。

说明：1. 江苏籍中不包括上海籍；2. 外国人未计入。

第二个原因是租界具有特殊的地位，它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这种特殊地位表现为在战争时期它是“中立区”，在和平时期它是中国政府异己力量的聚居地。前者第一次受大量人口涌入是在太平天国时期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县城，数量在2万以上。太平天国时期，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处于太平军和清军拉锯式的纷飞战火之中，使大量人口为躲避战乱而迁入租界。1860年时华人在租界的人数突增到30万，1862年则已达50万。不仅是平民百姓，那些在战乱或革命中被赶下台的官员，也大量逃

入租界。如武昌起义后，湖广总督瑞 就逃离武汉躲进上海租界。1911年11月3日上海光复，上海道刘燕翼、江南制造局总办张楚宝也先后逃入租界。1937年“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战区内的逃难者更是纷纷涌进上海，租界的人口达200万以上。上海租界完全成了一座“避难城”。至于政府的异己力量利用上海的特殊地位，出刊物、宣传革命、组织社团等等，更是不胜枚举。早年的康有为、黄遵宪得租界力量的庇护逃脱清廷的缉捕，后来的革命党人如龚超、章太炎、邹容也因租界的特殊地位而获释或轻判。黄兴、陈天华、张继、蔡元培、吴稚晖、章士钊、于佑任、龙泽厚、汪康年、张元济等大批革命党或新派人物都曾云集上海，光复会（1904年）、中华同盟会中部总会（1911年）、中国共产党（1921年）等组织也相继在上海诞生。他们都吸收了大量的人员。另外，商业和娱乐业的繁荣畸形发展，不仅吸收了大批从业者，也吸收了大批有钱的寓公。

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使上海人口飞速增长，20世纪初已突破100万，20年代前夕，上海人口过了200万，20年代末达到300万，到抗日战争爆发已近400万。这些进入上海的大量的移民，除了带给上海人口急剧膨胀这一畸形果子之外，就是他们也带来各地不同的文化习惯。这些文化习惯的碰

撞、交流和重组，不仅给上海带来生机和文化杂交后的旺盛生命力，同时，也铸造了新的人格。我们所说的上海人，就是在这样一种中国近代史的特殊历程和上海城市文化畸形发展，以及上海人移民的大汇聚的历史背景下铸就的。

注释：《上海7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序二”第3页。关于上海立县的确切时间有三说，一为至元二十七年，一为至元二十八年，一为至元二十九年，姑以现在通行说法，即上海建县700周年纪念所选之年份为建县年份。转引自《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第42页。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4~5页。《上海地方史资料》第3册第1页。转引之《上海史研究》二编，第46页。熊月之：《上海租界的双重影响》，《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第47页。《沪垣杂咏》卷三。《费唐法官研究上海租界情形报告书》卷一。

收稿日期：1998-10-05

[责任编辑 廖智宏]

[责任校对 黄世杰]

[作者简介] 陈华文，1959年生，浙江武义人，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金华，邮编：321004。

## A Brief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Shanghai People

Chen Huawe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Abstracts** :Shanghai is a city with specialities and world-influenc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cause of its specialities, “Shanghai Group”, in the eyes of the Chinese, not only stands for Shanghai people, but a term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peaceful co-existence of immigrants and co-development. This paper just supports this view.

**Key Words** :Shanghai people ;ethnic groups ;chinese-western culture ;immigrants ;humane features